

2020·民间古籍收藏保护“关键词”

壹 捐赠

2020年10月31日，浙江奥特莱斯广场有限公司向国家图书馆捐赠早期梵文《陀罗尼》经咒、明丽江版藏文《甘珠尔》、清康熙刻本藏文《甘珠尔》、清末铜版印刷《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四种四函件古籍。国家图书馆馆长饶权代表国家图书馆接受捐赠并表示，这是公藏机构与私人藏家共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回信精神，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切实举措，国家图书馆一定会将这些珍贵文献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浙江奥特莱斯广场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金亮多年从事公益事业，几次向公藏机构捐赠珍贵文献：2018年11月，向浙江图书馆捐赠宋版《太平御览》全帙；2019年，向南京栖霞寺捐赠“初唐敦煌写经”一卷。

2020年10月，吉林省磐石市曹文举老先生将个人收藏的一批中医古籍捐献给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曹文举老先生出身中医世家，其祖父曹志仁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曾在奉天（今沈阳）边开药店边行医，擅长治疗痔疮、癆病、红伤、肠胃等疾病。这些中医古籍即是其祖父所有，共有12套97册，经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考证，大多为清代中晚期及民国初年石印本，在他家已传近200年。曹老先生在耄耋之年依然保有对中医药事业的拳拳热爱之情，以及对后学的谆谆教诲之心，他希望这些古籍能在“最需要它”的地方继续发挥作用。

贰 培训

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提升民间古籍收藏者、古籍爱好者素养，《藏书报》举办“民间古籍收藏与保护线上培训”，邀请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陈红彦、古籍拍卖专家彭震尧、档案保护研究专家荆秀昆进行授课，内容为中国书籍史及宋元本赏鉴、古籍拍卖实操、民间古籍科学保护等。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民间古籍收藏工作委员会与《藏书报》联合举办“古籍收藏鉴赏阅读培训班”，分别邀请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际宁，著名藏书家韦力，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陈红彦，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溪，古籍碑帖收藏鉴定专家孟宪钧进行授课。来自图书馆、博物馆、拍卖公司、民间收藏机构和高校的20余位从业人员与古籍爱好者参加了培训班，既体现了“古籍圈”正在不断拓展的趋势，也给古籍行业发展提供了助力。

叁 普查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全国古籍普查一直是重中之重的一项工作，民间藏家亦积极参与，在公藏机构的帮助下开展家藏古籍的普查和整理。2014年甘肃省庆阳市藏书人顾登崔在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帮助和指导下，申请“全国古籍普查平台”账号进行家藏古籍的著录登记，截至2020年已普查完成2万多册。2020年1月，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民间收藏家张叔铭邀请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将所收藏的拓本及本地名人李南晖的著述版本进行了初步鉴别。2020年6月，为规范保护所藏古籍文献，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嘉禾博物馆和庆阳市环县黄志远专藏两家私人藏书机构在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对藏书环境进行了改善。

刚刚过去的2020年，注定将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深的印记。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激发出全国人民团结“抗疫”的巨大勇气，也深刻改变着大众文化生活。从藏书方面来说，2020年民间收藏保护依旧脚步不停，不仅各种活动活跃，而且队伍不断扩大，并积极关注、参与到古籍保护事业中，各方古籍保护社会力量或是在收藏、保护、利用方面倾注心力，或是在宣传、推广、服务方面付出良多。本期梳理了这一年的民间古籍收藏与保护的“关键词”，与读者一起回顾2020年民间古籍收藏保护的足迹。



金亮（左）向国图捐赠珍贵文献



小残卷斋藏古籍碑帖精品展



《赵城金藏》最新发现经卷暨唐宋重要佛教典籍特展



古籍收藏鉴赏阅读培训班

肆 出版

2020年，一部从东西方不同艺术史角度诠释东方版画艺术的《欧洲冯氏藏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全100册）出版。该丛刊由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中国古版画研究专家翁连溪和古籍拍卖从业者刘禹主编，收录宋代至民国各类版画；每种图籍分别由中、英两国学者撰写双语提要，成为一部版画收藏与研究的专著，也是目前为止收录数量最多的私人藏版画图录。

2020年，藏书家韦力继续寻访之旅，出版了《书楼探踪·江苏卷》《书院寻踪》两部新著，以脚步丈量方式致敬先贤，弘扬传统文化，受到读者青睐。由天津中医古籍收藏家陈景林和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范玉强主编的《津门医粹文物图集》，由家谱收藏家励双杰

和励聘操主编的《思经草堂藏稀见名家谱家训百种》，由黄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戴元枝主编的《清至民国徽州杂字文献集刊》，由河北青年收藏家贾江溶主编的《贾江溶藏稀见清代科举史料汇编》均依托藏家所藏珍本影印出版。苏州藏书家马骥将自己收藏的孙毓修信札影印，过录释文，并给每一位信札中的收信人、发信人撰写小传，推出《孙毓修友朋书札》，使民间藏古籍资源得到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此外，由河北藏书家赵俊杰主编的《稗海堂明清民国小说珍本丛刊·辛亥小说卷》2021年1月正式出版，由福建省收藏家陈亚元主编的《闽台粮户执照》、由山西省收藏家刘涛主编的《清至民国山西杂字文献集刊》也即将出版。

伍 展览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阻挡了人们进入图书馆、博物馆观展的步伐。浙江美术馆特邀民间藏家举办“其耘陌上——耕织图艺术特展”，以囊括清代耕织图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16件作品，集中表现了“耕织”所承载的文化意象和人文传统，并以“微信导览”和“虚拟展厅”的形式呈现这些精彩作品，以跨时间、跨类型、综合、立体、情景化的当代呈现方式，深刻表现了“耕织图”及“耕织”题材作品的艺术风格流变和多彩面貌。

2020年9月7日至13日，中贸圣佳拍卖公司举办了“小残卷斋藏古籍碑帖精品展”，展出了古籍碑帖收藏家孟宪钧先生所藏古籍善本、碑帖165种，并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了同名图录。此次拍卖，“小残卷斋”藏品专题含拍品94件，包含金冬心著作系列17种、陈皋稿本及写刻系列、笠泽丛书3种、读书敏求记版本系列、精刻诗词集系列、稿抄校本系列等。

2020年11月28日，“《赵

城金藏》最新发现经卷暨唐宋重要佛教典籍特展”在北京荣宝斋举办，此次展览以新发现的“妙法莲华经文句卷八”为核心，展出多卷唐宋重要佛教典籍。专家表示，此次现身的“妙法莲华经卷八”中，充分体现了《赵城金藏》雕刻过程中与《开宝藏》的覆刻关系，在文物价值以外也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此刚一露面，便引起学术界、革命后人、收藏人士的关注。

2020年12月26日，“与古为徒——中国古代金石书画及古籍名墨特展”展出，呈现了中国古代金石书画及古籍名墨系列共计70余件展品，包括吴大澂和吴湖帆先生题跋的金石拓片、书画精品；范景中先生、周小英女士的书画及藏书题跋；国内重要藏家收藏的刻本、稿本、拓本及名家名墨。这些展品或流传有序、出自名门，或版本稀见、写刻美观，通过藏家对书画、古籍、文房的收藏与鉴赏，既展现出传统文人的趣味，又通过对代表性藏品的解读，探寻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



轻拂纸上尘，回见百年身

——一个基层古籍普查员的帮扶独白

□ 潘 健 金陵图书馆

2007 年启动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其中古籍普查登记是实施该计划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新中国成立以來第一次由政府组织、收藏单位参与最多的一次全国性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从 2011 年全面推进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开始，截至 2020 年，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基本完成，在“十三五”收官之年，交上了一份厚厚的答卷。十余年来，一线古籍普查工作人员坚守初心信念，为保证普查质量与进度，耐住寂寞，甘于奉献，他们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本刊从新年首期启动“普查员手记”栏目，将系列刊发普查员工作过程中的苦与乐、感与思，这是故事，是讲述，也是古籍普查员栉风沐雨、筚路蓝缕、薪火相传、执着追求的真实写照。

2014 年的一个冬日清晨，天气阴冷。我像往常一样蜷缩着身体，捋着小碎步，唏嘘着逃进温暖的办公室。一路疾走，余光扫过主任办公桌，上面躺着一叠 A4 纸大小的出版合同，我探头瞥了眼朱红印章，刚才还摩挲着的冰冷身体，顿时一阵温热。

眼前将要出版的，是已经复核多遍的馆藏古籍普查成果。老实说，我馆数据并不算多，但是历经拆箱、整理、测量、编目、统计、校对……一路从无到有，倾注了我们全部的热情。如今将要出版，我的内心像极了送嫁的爹娘，百感交集。

或许在旁人眼里，我的工作令人艳羡：着一袭蓝布大褂，自由畅游书海，轻拂纸上尘，回见

百年身，与古书相伴的意趣，丰盈而美好。其实古籍的味道，并不都是书香，而是更多混杂着樟脑、芸香、菌尘和湿霉气。相比雅士在苍苔盈阶、松影参差之境烹茶读书的悠然自得，一个基层普查员面对典籍的心境，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当你轻提书脑，纸叶翩翩，抖落出的不光有斑驳岁月，还有蠹鱼采挖的崎岖虫道，以及沿途种下的黑色排泄物时，你会下意识地调整起口罩与口臭的贴合度。这样的情境，如果不是肩负责任，如果不是源于热爱，会很容易因感到枯燥而心生挫败。

的确，古籍普查工作平凡而伟大，对于摸清家底和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政策，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然而普查十年，工作何以仍未完成？根源在基层。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的前几年，古籍普查工作还没有向基层图书馆渗透，再加上基层单位经费不足，读者对古籍文献的需求有限，因而对馆藏古籍并不重视。同时，区县一级公共馆自身编制紧缺，不会配备专职人员从事古籍保护工作，更不要说建立积极有效的古籍管理制度。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面对上述问题，作为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的金陵图书馆提前布局，意欲用“市馆驱动+区馆联动”的协同方式，走出一着快棋，力图迅速改变南京地区的这一窘状。

2015 年春，我们先后到江宁区图书馆、高淳区图书馆、溧水区图书馆、六合区图书馆等有古籍收藏的区县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了解了各区县馆的古籍收藏情况，随后结合各馆和自身馆情实际，制订了相应的普查办法。

2015 年夏，我们又奔赴秦淮区图书馆协助进行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从秦淮区图书馆古籍藏量和上级部门规定完成的时间节点来看，此次普查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要求严。为了不影响普查进度，同时又保质保量地

完成任务，我和同事压缩吃饭和休息时间，认真地进行近 5000 部古籍的整理、查阅、测量、登记、录入工作。就这样，我们守着寂寞，枯坐板凳，数月的酷暑炎夏，不觉在阴郁憋闷的书库里消解大半，现在想来，颇有“山中数日”之感。

2016 年，我们再次前往各区县馆校对存疑数据，并拍摄善本书影，力求将普查工作做深做细，同时也为后期的《南京市公共图书馆古籍善本题录》的出版奠定资源基础。终于，至 2016 年底，历时两年的全市古籍普查帮扶工作圆满收官。

当然，古籍普查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大多数基层馆更多地表现出某种共性。

第一，在基层馆，因为职数的限制，古籍普查工作人员多为从其他部门抽调或者临时招聘，缺乏专业背景。我在普查帮扶工作中发现，因为缺乏版本鉴定的经验，有的工作人员将民国铅印本误定为宋本而闹了笑话。所以，倘若古籍普查人员不具备版本鉴定、古籍编目的能力，面对古籍将无从下手，古籍保护工作就变成了单纯的古籍保管工作。从长远来看，基层馆需要建立一支具有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学、历史文献学、古汉语等知识的复合型古籍保护人才队伍。

若短期内无法解决专业古籍保护人才缺乏的问题，除了可以向上级古籍保护中心寻求帮助，或者选送人员参加各种古籍业务培训外，还可以借鉴“中华古籍普查志愿服务行动”的成功经验，向高校文博专业、文史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寻求帮助。

第二，古籍普查登记和编目工作中，要了解某个人名、室名、别号、地名、年代、职官、藏书印等，往往需要查阅有关工具书。但在基层馆中，古籍工具书配备不齐的现象非常普遍，普查人员遇到问题无处查找，严重影响了



古籍普查的开展和进度。因此，建议区县公共图书馆为古籍工作相关部门配备常用工具书，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历史纪年表》《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国篆刻大字典》《中国人名大词典》等，以方便开展工作。

第三，古籍普查工作原是依托于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开发这一平台的初衷是便于数据统一管理。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的著录项类别多样，包括古籍基本属性、级别等次、破损等级、装具、书影等，尽管十分详尽，但是无论信息录入还是版本考证的过程，都耗时费力，这使得古籍普查工作进度缓慢，效率低下。在实际普查过程中，我们应转换思路，简化程序，突出重点，提高普查效率。

第四，著录依据缺失下的古籍普查登录难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一般情况下，对于著录信息明确的古籍，普查人员能够快速准确地抓取到登录信息。但是面对著录依据缺失的古籍，就需要依靠专业知识以及经验、眼力，通过查询考证加以揭示。可现实情况是，不要说基层公共馆，就是大型公共馆，也存在资深古籍管理人员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而新进人员尚未成长起来的问

题，大量古籍普查人员在古籍鉴定方面缺乏经验，面对没有明确版本信息的古籍，充其量只能判定年代，具体什么时期就无法考证了。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网络比法就会十分省力。当然，这应建立在已有数字资源开放的前提下。例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一些大馆都建有古籍书目数据库，另外，国学数典、爱如生、孔夫子旧书网等网站上有书影和书志也可借鉴，在时间紧迫的前提下，利用网络比法免去了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证，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走捷径的方法只能是辅助，若能通过自己查找资料进行考证，可以不断积累版本目录学的经验，从而让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工作中逐步提高。

南京地区古籍普查工作完成已经四年有余，但古籍保护工作还在继续。回首十多年埋头走过的长路，自觉收获满满，可再回过头往前看，又好像还在起点。因为手头的活计远谈不上练达，就算再修行个三五十年，也难免挂一漏万。我时常想，古籍保护工作特别考验人性，越精进，越敬畏，这种感觉很诡异，正如古希腊先哲芝诺所说：你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古籍有生命吗？

非生物体的物质没有新陈代谢，但与生物体相同的是，它们都是由无数个运动着的分子构成的。这些运动着的分子和周围环境不断进行着物质的交换和能量的流动，在物理的或化学的作用力下有可能发生变化。

对于生物体而言，生命是生物体具有活动能力的体现，而非生物体的生命概念多与该物质实体是否存在及其原有性质是否消失相关。例如，古籍纸张无法承受翻阅，墨迹已经退化或消失等就是其生命受损的表现。因此，非生物体也应有寿命一说。对于古籍而言，其寿命应是从其形成始直到其完全无法被利用为止。

古籍载体的寿命长短受

两大类因素的影响，一类是古籍载体材质的自身性质，另一类是外界因素。任何物质即使没有外力的影响，在其分子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过程中，也会因为时间而改变原有的性质，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是必然发生的“生命”历程，一般称为自然老化或陈化，属于自然损耗与消亡。因此，古籍即使只藏不用，哪怕是保存在较为理想的环境中，其寿命也是有限的，要使其生命永存是不可能的。当然，材质的“DNA”不同，其寿命是有差别的，这也就是皇家的传世典籍要选用最好的纸和墨书写和印制的原因。

纸张质量有高低，历代

印书用纸均根据书籍的不同用途，采用不同的纸张印刷。一般来说，进呈御览、供奉内廷陈设的书籍用纸最佳，多为连四纸（开化纸）等上等纸品；用于赏阅乃至流通或售卖的本子则纸质较差。清宫内府写本、刻本不仅用墨非常讲究，研墨用水也非同一般，常用沉檀水、龙脑水等。沉檀泡水研墨，墨香与水香结合，除防虫防蛀外，开卷即自有墨书香。

纸质文献具有易受潮、热损、惧酸、厌氧、发霉虫蚀、可燃、形体易损等特性。因此，古籍周围的环境也直接影响到其载体的寿命。若古籍周围的环境充满促进古籍载体材质变质的因素（如光、不适宜的温度和相

对湿度，污浊的空气等），或是古籍遭受外力损坏和生物危害，其寿命都会缩短。这也就是为什么同一时期的典籍，即使用同种纸、同种墨书写和印制而成，经历了不同的保存环境后，其寿命长短也会完全不同。

人类是希望能够永久地跨越时空与先人对话的，但记录古人思想的载体却是无法永存的，探讨如何减少古籍周围环境对它的损坏以及怎样为古籍续命，就成为古今中外传承文化的重要话题。呵护古籍生命的方法和途径，既与管理的科学性相关，也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特邀嘉宾：刘家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
学院教授、古籍保护专家）

古籍是由其内容和内容所依附的载体共同构成的实物。就册籍书画而言，纸张和墨迹都是承载古人思想的载体，都是古籍的物质实体。这些非生物体的物质和生物体一样也是有生命的，只是生命的定义不同而已。与生物体不一样的是，

四川成都浣花溪头的杜甫草堂内，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不时能听到成群游客的喧闹声。但有一个地方却十分安静，去到那里参观的游客或是怕打扰工作人员工作，或是被那些为古书治病的“白衣天使”的工作氛围感染，都变得雅静、安然，这个地方便是杜甫草堂古籍修复展示馆。古籍修复展示馆被透明玻璃分隔成两部分，里面是古籍修复室，外面展陈着古籍修复的常用工具、修复前后的古籍等，游客在赏阅展品时，也可以透过玻璃观看修复人员的实际操作。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一直致力于馆内外书画文物等纸质藏品的修复，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设立了书画装裱室。2010年，杜甫草堂博物馆正式设立古籍修复室。2016年，跨系统联动申报成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四川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并在传习所导师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古书画修复专家徐建华的帮助和指导下，在书画装裱、古籍修复的传承与发扬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草堂的修复师欧萍是四川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的导师助理，她于1986年进入草堂工作，30多年弹指一挥间，当年那个差点儿被“不收女徒弟”为由而拒之门外的小姑娘，如最初承诺的那般，不怕苦累，在热爱中坚守与远行至今。

执着：几经考验学修复

欧萍进入杜甫草堂之初，没有直接从事书画装裱、古籍修复，而是在陈列宣传部负责宣传与销售有关杜甫草堂的书籍和其他文化产品。1990年，经由四川省文化厅宋之正先生引荐，她认识了四川省博物馆书画装裱修复专家廖定一老师，并利用业余时间求教廖先生学习这门技艺。对书画修复装裱有了一定认识后，欧萍向草堂的领导申请调到书画装裱室工作，领导告诉她：“我没有意见，你去和张师傅说好了。”这位张师傅，便是杜甫草堂的“第一代”纸质文物修复师张润生。没想到的是，因为性别，欧萍在求学书画修复装裱的道路上屡屡受挫。先是被张师傅一句“我们这里不要女的”很直白地回绝，后求拜廖定一先生门下，同样遭到谢绝。廖定一先生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我不收女徒弟，是因为这个工作太累了，又要拿刀，又要拿棍，你们结婚后还要带孩子、照顾家庭，忙不过来的。”听到这番话后，欧萍并没有气馁，她告诉廖定一先生，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自己不怕苦累，也会将两者分清楚，并表示自己十分想学，请他收自己为徒。见欧萍坚持，廖定一先生便说：“拜师就不必了，你离这里近，若是想学，得空了过来就行。”那之后，欧萍每天晚上下班后都到廖先生处学习，耳濡目染地学到了很多知识。

因为想从事书画修复装裱这份工作，不久后，欧萍再次来到草堂书画装裱室向张师傅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工作的喜欢，张师傅见她如此坚持，也不忍拒绝，便说：“那你去刷仿绫纸吧。”仿绫纸没有拉力，刷的时候极易破损，“张师傅是在考我，但因为我有在廖老师那里学到的一些小经验，所以我细心刷出的仿绫纸很直、很平”。张师傅看到欧萍交上的“答卷”后，满意地笑了笑，说：“你还有机会哦。”欧萍便紧接着问：“那您同意我留在这里吗？”不爱说话的张师傅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

进入草堂书画装裱室后，欧萍白天上班时跟随张师傅学习，晚上下班后依旧到四川省博物馆廖先生处，与其沟通交流，并参与一些修复工作。2000年冬，国家文物局在江西婺源举办了为期3个月的“首期全国书画装裱修复培训班”，欧萍有幸成为18位学员中的一位。“当时授课的三位老师分别是张金英、徐建华、杨泽华，

杜甫草堂欧萍：一位古籍修复师的“进阶史”

□本报记者 张颖



◀“草堂一课”墨韵书香系列之传拓技艺宣讲



▲修复《安县志》前的检查工作

他们非常和善，对我们也非常有耐心，因为课上修复的书画文物十分珍贵，且学员们的修复水平不一，所以三位老师可谓手把手教学，让我受益匪浅。”也就是在这次培训班上，欧萍成为徐建华先生的徒弟，“那以后每每遇到较难的装裱、修复案例，我总会第一时间想请教徐老师。但那时通讯还不是很发达，加之徐老师经常外出授课，所以联系到徐老师很难”。

从婺源接受培训回到成都后，欧萍对字画、古籍等文物藏品的保护修复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坚守修复事业的信念愈加明确。

实践：因地制宜做修复

从事书画装裱、古籍修复以来，欧萍接触到的纸质文物“病因”大都是霉蚀、虫蛀、酸化，有时也会遇到不常见的问题，这时就需要请教老师们。据欧萍介绍，修复时曾遇到过“洋墨水”的问题，“洋墨水遇水便晕开，最后和水一起流走，消失不见”，但那是纸质文物上的重要信息，绝对不能丢失的。欧萍根据徐建华先生的建议，将宣纸夹在有墨迹的地方，以起到吸收撤潮的作用，“这样虽然还会有晕色的情况出现，但是效果会好很多”。2017年，在一次有关佛教典籍的培训班上，一位上海的法师询问欧萍，自己那里有一通掉“墨”的石碑，但不知掉的“墨”是哪里的，该怎么处理。“通过传拓所得的拓片是墨在上，墨色不应透过背部，但他描述的这块石碑是指表面有异物，会一并附着在拓片背部，我无法判断这种黑色粉末的材质”，于是致电赵嘉福老师询问。赵老师回复她说，古人喜欢用干粉似的东西抹在石碑上，抹上这些粉以后才能更好地雕刻，这些碑身上就会不可避免地留下一些黑色的墨粉，这便是欧萍询问的“不知名粉末”。“师父们见多识广，我还要多向他们学习。”欧萍感慨。

数十年的修复工作中，欧萍印象最深的就是《安县志》的修复。据欧萍介绍，她拿到那册《安县志》时，发现书破损得非常严重，第一页就是由一小块一小块的纸屑组成的，书名“安县志”完全无法辨认，“安县图书馆的馆长将这册书送来时说，‘尽力修吧，书名找不回来就算了’，但我不那么想，我觉得这册书既然交到了我的手上，我就一定要尽全力修好它。当

时，我每揭下一小块儿，就先判断这一小块儿的具体位置，然后逐一按尺寸、顺序拼好，‘安县志’那三个字，在我日复一日的努力下，慢慢地显现出了字形……我清楚地记得仅第一页，我揭开就用了20多天的时间”。往往最难修复的书，在修复成功后，修复师的成就感就越大，当欧萍把修好的《安县志》送回安县图书馆的时候，馆长的一句“我真不敢想象，‘安县志’这三个字还能找回来”，让欧萍更为激动。

书画、古籍的修复各有不同的注意事项，拓片也是。2007年，四川省博物馆曾策划举办汉代画像砖拓片展，但展期将至，需要修复的拓片却还有很多，“他们找到草堂帮忙，当时我分到了36张他们送来的有待修复的拓片，全部都是六尺和八尺的大型拓片”。欧萍介绍说，修复拓片需要“保字口”，“拓片上的那些字、画都是有凹凸感的，如果直接用刷子刷，它的字口会变形，对拓片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破坏。所以我们在修复时，首先要将字口打出来（目的是固定原本拓印的字形），这样修复完成后，拓片中的字体才不会变形”。

建设：草堂“日日新”

1986年，草堂书画装裱室只有张润生师傅和他的一名徒弟，但这名徒弟后来离开了草堂，自己开了一家装裱铺子。“张师傅一个人忙不过来，所以草堂就又陆续招了两名修复师，1990年我加入后，书画装裱室一共是4个人。”欧萍介绍说，“那时，老师傅们还没有建设装裱室的想法，但我加入后就想，既然我们在做这件事情，那就要做好、做大。”30年来，在欧萍等人的努力和草堂领导的支持下，书画装裱室（及古籍修复室）搬迁了3个地方，面积也从最开始的30多平方米增加到300多平方米，还陆续专门改造建设了书画修复室、古籍修复室，特设了古籍修复展示馆，人员也从4人增加到8人，“但草堂书画装裱室（及古籍修复室）的大踏步发展，还是从2007年开始的”。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实施，古籍修复事业日益受到重视，草堂增加古籍修复的工作，开始修复馆藏和其他公藏单位的古籍。2010年，杜甫草堂与四川省图书馆成立了联合古籍修复室，共同开展有关古籍的修复及培训工作。联合古籍修复室自成立后吸引了有关领导以及

文博单位的注意，随着影响的逐步扩大，2015年，杜甫草堂计划筹建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并邀请徐建华先生来指导工作。在徐建华先生的指导下，杜甫草堂的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顺利建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16年，四川省图书馆联合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申请并成立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四川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在欧萍的介绍与联系下，徐建华先生担任传习所的导师，“20年后能再续我与徐老师的师生缘，且还可以惠及传习所的其他同仁，我十分高兴”。

影响：尽力发挥博物馆的社会作用

从事书画修复装裱30多年来，欧萍遇到过很多困难，工作上的困难尚可以求助老师，自己也可以通过努力解决，“但有时候，我的家人也会怪我因为工作忽略了家庭。比如修复时有些步骤是不能中断的，常常做完回家就晚上十点多钟了”。对于晚归，欧萍没有过多的解释，只是告诉家人，可以去草堂的修复室看看自己的工作和工作时的状态。“他们见我一展开工作便彻底投入进去，也不好打扰，只是在我结束的时候问了一句‘你饿吗’，我说，‘现在感觉有点饿了’。医生在手术时中间不可以休息，我们也是，我经常打开一幅画，一站就是一天，等一个工序做完，天已经很晚了。”数十年来，草堂的门卫师傅倒是很理解欧萍，每天晚上八九点钟见她还在工作，师傅就拎着两壶热水给她送去，并轻声嘱咐，忙完早点回家休息。

书画装裱、古籍修复、碑刻传拓作为传统技艺，需要得到传承和发展，能够由家人而普及到社会是欧萍的愿望。近年来，杜甫草堂的宣传教育部门开展了“草堂一课”的博物馆社会教育公益活动，欧萍作为讲师，向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不同国籍的人士展示传拓技艺、古籍制作以及简单的修复，“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女士曾走到我身边观看演示传拓，还有许多国际友人也来体验过传统文化课程。在‘草堂一课’和我们的‘古籍修复展示馆’，我们可以感受到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参与度在不断提升，社会各个层面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我们会继续把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做好的同时把公众教育也尽力做好，并扩大规模，启蒙学生、影响他人，尽力发挥博物馆的社会作用”。

清宫存藏四库全毁书

□王秋菊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禁书活动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为封建文化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上自秦朝，下迄明清，贯穿于中国帝王专制社会的始终，为历代帝王所继承与发展。清朝统治者自入关以来，为巩固其专制统治，清朝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禁书狂潮，而乾隆帝“寓禁于征”的策略，将禁书运动推向了极致，为中国古代禁书活动之顶峰。

乾隆一朝征书禁书活动起因于纂修《四库全书》。乾隆帝本意是修《四库全书》来超越宋明以来所编纂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永乐大典》等，表面上博稽古右文之美称，实际上以寓禁于征为主旨，欲借征书之际来查禁销毁表达反清思想的各种著作。

征书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谕内阁着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自颁征书之谕以来，各省巡抚多存观望；而奏到书单，寥寥无几，俱恐因此复造成大狱，或有进呈，也多为普通书籍。遂复下诏对于各督抚之切责，刚柔并济，恐诱兼施；并诱进民间藏书，特别是江浙二省，令遵旨进呈，加之以奖励，藏家疑惧释怀，自始献书之路大开。

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高宗屡下严旨，搜求遗书，一方面“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另一方面“或有妄诞字句，不应留以貽惑后学者，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此时，其禁书之意已有显露。之后各省进书络绎不绝，因未见稍有忌讳者，故三十九年（1774）八月初五日“寄谕各督抚查办违碍书籍即行具奏”，已明确禁毁违碍书籍：“前曾谕令各督抚采访遗书，汇登册府，下诏数月，应者寥寥。彼时恐有司等因遗编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干碍，而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因复明切宣谕，即或字义触碍，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不必过于畏首畏尾，朕断

不可因访求遗籍，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以书中或有忌讳诞妄字句，不应留以貽惑后学者，进到时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至督抚等经手汇送，更无关碍。朕办事光明正大，各督抚皆所深知，岂尚不能见信于天？该督抚等接奉前旨，自应将可备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明，方为实力办理……况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至各省已经进到之书，现交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碍碍者，即行撤出销毁。”

乾隆帝这道谕旨，是一个由征书转向查缴所谓违碍书籍的进军号。自此，大规模查缴违碍书籍的活动拉开了序幕。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禁书运动方告结束。征书十载，禁书近二十载。两者几乎同步，相辅相成，是对当时全国藏存文化典籍所作的一次深入的官方清理。其涉及范围之广、禁令之严酷、措施之得力，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宋元以后的文化典籍无疑是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

清代的禁书，概而言之，原因有二：一曰因言而禁毁，二曰因人而禁毁。因言禁毁大体上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有关明季野史、笔记以及明清之际的史述、奏疏、文集、诗集、戏曲、兵书、方志、碑刻、制艺选本等。凡事关清王朝确立、种族观念、抵御清兵入侵等主题，禁毁手段极为惨烈，故大都佐以文字狱、笔祸，打击的对象为奉汉族统治为正统意识的知识分子，以树立清统治者在汉族中的思想权威。二是对小说、戏曲、唱本以及语录等通俗读物的查禁，其主要打击对象

为普通大众、书肆与坊间，手段也相对温和，其指导思想为“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人之书”，即以儒家正统思想整肃百姓头脑，使满清贵族的统治得以深入人心。

因人而禁毁是为达到禁书目的，选出所谓“罪大恶极，悖逆不赦”者，戮其身，焚其书，杀一儆百，以为其他知识分子戒。特于军机处设专案查禁司，被列入首恶的有钱谦益、屈大均、金堡、吕留良、王锡侯、徐述夔、卓长岭、戴孝移、戴昆、孔继汾、尹嘉铨、李清等著作，大半非应销毁之书，重人不重书，其人片纸只字，皆不容留。

乾隆帝的惊人之举是将先帝顺治之《谕宏觉师》，康熙之《御批通鉴纲目续编》，雍正之《大义觉迷录》皆列为禁书。

顺治帝崇佛，曾以高僧玉林为师，法号行痴。帝王出家为僧徒与正统思想不合，有损于皇室尊严。其文《谕宏觉师》，在乾隆帝看来应作为绝密文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宜完全公开。康熙帝御批《通鉴纲目》59卷，《前编》1卷，《外纪》1卷，《举要》3卷，《续编》277卷，已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史评类，经乾隆详加审阅后，发现《续编》27卷不仅在辽金元三朝人名、地名译音上多有讹舛鄙俚之处，而且其书后所附周礼原撰《发明》、张时泰原撰《广义》各条中，于“辽金元三朝时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者”，如不予以查禁，则与所宣禁书原则不合，恐为世人笑柄。仅此一书，查缴颇费周折。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亦即禁书活动即将结束时，共查获2668部，遍及18省，浙江最多，有596部，甘肃最少，仅2部。雍正帝御纂《大义觉迷录》4卷，书中收上谕10道，审讯词与曾静等人口供48篇，后附曾静《归仁说》。雍正帝不惜以万乘之尊，将吕留良、曾静等悖逆之言及其御旨一一刊刻，颁布天下，尽人皆知。乾隆帝认为有损乃父威名，予以矫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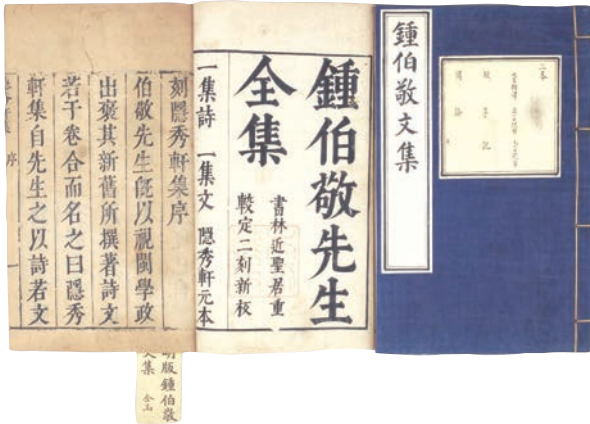
上述禁书逸事三宗，反映出顺、康、雍、乾四代君主之共性与个性特征，也是中国文化史、禁书史上的绝笔与妙笔，而乾隆帝“寓禁于征”的策略乃空前绝后，真可谓“于先朝手泽、祖宗事实，尚可任意存废，何论其余”，是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次大劫难。

禁书按其禁毁的程度分为“全毁”“抽毁”“应毁”“违碍”“撤毁”五种。在近20年的禁书过程中，据学者统计，共禁毁3100余种，151000余部；销毁书版80000余块；征、收、禁书共约10254种，入《四库全书》3461种（约占1/3），存目6793种（约占2/3），其中包括查抄违碍书籍3100种。这些查抄违碍书籍主要从存目中检出，另有十余种是从已入《四库全书》者检出。

虽然禁书活动持续时间长、范围广，禁令严酷，措施得力，

著述，文献足征，纂修史书时有所采择。其中乾隆年间各地督抚学政奏缴，奉旨禁毁之书，至今尚存故宫者共83种，计史部33种、子部16种、集部34种，《禁毁书目》均有著录，是四库禁毁书之精华，其中多为善本、孤本，具有较高文献价值。其内容既有因反映“华夷之分与民族意识及揭露清兵暴行，鼓励人民反抗清兵”而遭禁毁之书，也有因事涉边防辽事用兵而被禁毁的书，还有因触犯清廷禁忌者而在劫难逃的“违碍”之书，更有世间流传较少的因查出某人某一作品有悖谬文字，进而扩及其全部著作，甚至已经收入《四库全书》者，均一并遭撤毁。在天地坦荡、风清气白之际，重现人间，剥掉“盛世”的粉饰，拾回了文明的碎片，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历史本来的面目，对于重新审视“康乾盛世”，具有重要意义。

（未完待续）



但是有如历代禁毁、焚毁书籍一样，不可能净尽根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嘉道以降，抗清起义风起云涌，外国侵略纷至沓来，清朝国势日衰，文网疏弛，而那些劫后幸存的禁毁书以其自身含有历史真实性及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各种方式流传行世。

清宫所存藏禁毁图书，大抵为四库馆臣查办时所遗存，而史馆诸臣以此类书籍皆明末清初人

“南北宫词纪”

□凌一鸣 天津师范大学

《新镌古今大雅北宫词纪》与《新镌古今大雅南宫词纪》均为六卷、六册，明陈所闻选编，明陈邦泰辑次，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现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此二书均为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北宫词纪》前有万历三十二年焦竑序，万历三十二年朱之蕃序，卷端题“秣陵陈所闻苕卿梓选，陈邦泰大来辑次”《南宫词纪》前有万历三十三年俞彦序，又有顾起元题诗，卷端亦题“秣陵陈所闻苕卿梓选，陈邦泰大来辑次”。内封镌“南北宫词纪”。

此二书行款版式基本相同，《北宫词纪》板框（21.3厘米×14.3厘米）高于《南宫词

纪》（18.8厘米×14.5厘米）。但因二书编、刻者均同，故合称“南北宫词纪”，并常著录为一书。此本有明显漫漶痕迹，并有缺叶若干。持之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相较，行款版式相同，但国图与北大本内封书名下原镌“继志斋刻”，普林斯顿大学本则无，故虽为初刻，当为后印。

此二书最早著录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但失录编者姓名。今据卷端，是书编者为明人陈所闻，刊者为陈邦泰。所闻生卒不详，字苕卿，仁和人（一

说上元人），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举人，除此二集外，尚有自撰传奇杂剧若干。二书均为陈邦泰继志斋所刻。陈邦泰，字大来，南京人，万历间刻书家，梓行戏曲颇多，如《重校琵琶记》《重校玉簪记》《新镌半夜雷轰荐福碑杂剧》等。

“南北宫词纪”选材的标准和出发点均见于二书凡例。《北宫词纪》凡例称：“予所选，大都事与情谐，神髓景会，质不俚，文不支。”究其旨，以“典雅”为尚。《南宫词纪》凡例则称：“予所选，有豪爽者，有隽逸者，有

凄婉者，有诙谐者，总之，锦绣为质，声调合符。”可见二者除了南北差异之外，在内容上也有些许差别。

由于此二书为研究元明时期散曲的重要著作，后来的研究者与整理者对其也非常重视。郑振铎先生曾在厂肆中搜得八部“南北宫词纪”，从质量较差、断板烂板的后印本到初印无阙者均予购取。直到多年后，终于凑齐了一部完本，郑氏直呼“可能是人间无上的本子也”。可见郑先生对此二书的珍视，也可略窥爱书者的拳拳之情。王贵忱先

生也曾购得一冒鹤亭旧藏万历刻本《北宫词纪》，喜不自胜，并撰成书跋。书缘绵延，正如学脉不断，藏书读书的乐趣也正在于此。

中华书局曾以《新镌古今大雅南北宫词纪》为名，合此二书为十二卷，延请俗文学研究大家赵景深先生校订整理，并于1959年出版排印本。其所据为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刻后印本。三年后，吴晓铃先生出自家所藏万历刻本，补以《北宫词纪外集》三卷，以《南北宫词纪校补》为书名于中华书局出版排印本。

